

主编

李匡武

副主编

周云之

周文英

中国 逻辑史 唐 明 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國邏輯史

歐陽中石題



《中國邏輯史》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副主編

編 委

李匡武

周云之 周文英

（按姓氏筆畫為序）

中国逻辑史

(唐明卷)

李匡武 主编 周云之 周文英 副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2 字数12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145

ISBN 7 - 226-00495-X/B · 35 定价: 2.80元

朱志凱

刘培育

李匡武

陈孟麟

沈劍英

周云之

周文英

全书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森

孙中原

朱志凱

刘培育

李元庆

何应灿

李建钊

陈正英

陈孟麟

沈劍英

张清宇

周山

周云之

周文英

郑伟宏

欧阳中石

崔清田

高振农

高银秀

董志铁

杨俊光

葛黔君

蔡伯铭



本卷责任编辑委

沈剑英

本卷撰稿人

沈剑英

王森

欧阳中石

引 言

第一节 唐—明时期社会发展概况和 逻辑思想发展的三个方面

中国历史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分争之后，至隋又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统一。在从西晋开始的三百多年里，人民一直生活在激烈的斗争之中，或是政权内部的争夺，或是尖锐的阶级矛盾，或是民族的矛盾，各种矛盾交织的结果，形成了一种长期的混乱局面。这种局面早为人们所忧患厌倦，都希望得到生活上的安定，所以杨坚便较为容易地统一了南北朝而建立起“隋”王朝。这是历史的必然。

隋王朝的初期，由于政权的相对稳定，经济上也自然地呈现出一定的繁荣和发展。但好景不长，炀帝荒淫奢侈，聚暴残虐，无限制地滥用民力物力，连年用兵，人民重又陷入了年役、劳役、赋役的严重压榨之下，无法活命，终于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仅仅七、八年之间，腐朽残暴的隋王朝就被摧毁推翻，从而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唐”王朝。

唐在隋的基础上吸取了隋失势的教训，易弦更张，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统一局面，于是很快地出现了为史家称道的“贞观之治”。直到安、史之乱以前，一直处在发展之中，成为世界上富庶的、有高

度文明的大国。

然而，统治者骄奢淫逸，对人民的剥削越来越重，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分崩的局面。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各种矛盾错综交织，而人民则完全陷于战乱灾荒、繁赋重役之中，卖儿鬻女，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甚至到了连草根树叶都没得可吃的程度。广大人民忍无可忍，公元874年终于暴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黄巢义军转战南北，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的各种势力。虽然这次起义最后未能成功，仍大大挫伤了唐王朝的元气，二十多年后，这个封建大王朝就灭亡了。

由于初唐的鼎盛，生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政权的统一，国际间交流的频繁，都为文化科学的发达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印刷术的发明，印书业的发展，天文学的进步，历法的进步与仪器的创造，数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地理学的精研，医学的入微分科，药物学上“药典”的颁布，都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确有空前的发展。

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哲学、文学、艺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哲学上，儒、道、释各家都争相鸣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从未休止，而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都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在许多问题上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

唐室衰亡以后，经过五代十国的纷争，赵匡胤夺取了周朝政权，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建立了宋王朝（公元960年）。

宋统治者为了消除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对上层官僚地主集团采取了特别优容的政策。他们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出现了严重的阶级矛盾。虽然王安石的变法有缓解阶级矛盾的可能，但却受到大官僚地主集团的强烈反对，新法被黜。在矛盾

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北方金人乘机进攻，北宋王朝终于瓦解了。

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对外年年要交纳大量贡品，不堪支持，而内政又日见腐败，国力日衰。最后是蒙古贵族灭了南宋而建立起统一的政权。

元朝统治者残暴落后，压榨更加野蛮，致使广大人民完全陷于了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了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反抗。经过长期的积聚和酝酿之后，终于在公元1351年暴发了农民大起义，推翻元朝的封建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最后夺得胜利果实，成立了明王朝，社会出现了较为稳定的繁荣局面。但到了明代中叶，阶级矛盾又日益激化起来。自公元1448年开始，各地的起义相继而起。至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义军攻克北京，明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

自公元960年至公元1644年的宋、元、明时代，在长达67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广大人民处于频繁的战乱之中，但只要稍得安定，便尽力地进行生产劳动。因而，在这时期内，无论经济、文化、科学，都有了很大发展。

宋以后，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兴起了一些工商业城市。丝织、造纸、冶铁等业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行业。生产的发达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宋代著名的火药、罗盘针、活版印刷三大发明。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了当时天文、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医药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并且记载了劳动人民在实际劳动中的发明创造。我们从这部科学巨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我国的科学水平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元、明两代，特别是明，农业手工业更为发达，纺织业、瓷器、漆器、冶铁、铸造以及农产品的加工技艺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科学的总结性巨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辑录了古代农田水利和耕作的丰富经

验，提出了对实践的改造创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为我国古代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是世界科学史上的重要经典。

宋、元、明时代的统治者既加强封建中央的专制，又从哲学上加紧了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他们为封建的纲常找到了哲学的依据，就是“理”。“理”成了哲学上的最高范畴，“理学”成了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力标榜的哲学思想流派。

文化科学的成就和哲学上的探讨与论争，必然会促进逻辑思想的发展。虽然从两汉至南北朝，我国的逻辑思想大都与哲学思想混糅在一起，专门的逻辑著作也大都散佚漫失，然而随着社会生产、经济的上升，逻辑思想又必然要向前推进，取得一定的发展。

唐一明时期的逻辑思想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是一般名辩思想的发展，第二是印度的新因明传入中土以后得到的发展（汉传因明），第三是西藏佛教对量论的深入研究（藏传因明）。上述三方面中，当以汉传和藏传因明为代表，因为这一时期一般的名辩思想仍大都寓于政论和哲学的著述之中，须着力爬梳勾稽才能见其脉络，而汉传和藏传因明则是专门的逻辑科学，它虽然是外来的文化，但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在中土和边陲西藏开花结果，产生了许多阐发佛教逻辑的专著。

第二节 唐一明时期一般名辩思想简述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已开始而且渐趋定型，即学制有定可循，诗歌由古体渐成近体，律诗、绝句斐然成章，书法艺术也由崇尚神韵而转为追求法度。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一种趋势，即都向“法”字皈依了过来。这种尚“法”定制的习尚，必然要反映到思维上来。但唐代的一般名辩思想还不很活跃，仅就经籍著录来

着，仍甚为寥寂。《隋书》中名家只列《邓析》、《尹文》、《士操》、《人物志》四部；《旧唐书·经籍》中名家列了《邓析》、《尹文》、《公孙龙》、《人物志》、《士纬》、《士操》、《九州人士论》，《兼名苑》、《辩名苑》等十二部；《新唐书·艺文》中多列了不同的《人物志》及《广人物志》，除已散亡者外，基本上已将名实之论偏向人物志一个角度，而没有作出更高深的开拓。

但如果把视野扩大一些，从其他各种论著中稍加梳理，仍可寻绎出名辩思想发展的脉络。在过去被认为“荒原”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不容忽视的可贵史料。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举一反三的逻辑要求，阐述了对名实关系的见解和处理名实关系的方法等。韩愈在其著述中亦阐明了他的正名思想，并经常在论述中借重于归纳论证的方法。刘禹锡在《天论》中提出以理揆度的逻辑要求，表述了他的刑名思想。柳宗元更在他的著作中充分阐述“定经界，核名实”的逻辑思想，并善于运用“不类”的逻辑方法来进行论证。

由上述简要的说明可知，这一时期的一些学者在运用逻辑上具有相当的能力，他们的名辩思想也局部地在文章中阐述出来。然而，遗憾的是他们阐述的名辩思想还比较零碎，缺乏系统的论述，也就是说逻辑的自觉还不够明显。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关于逻辑的一些原则问题均有涉及，这说明我们的古典名辩逻辑并未泯然中断，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已。

宋以后的名辩思想要丰富得多。虽然从著录来看仍不免显得冷落，如《宋史·艺文志》只有《公孙龙》、《尹文》、《邓析》、《人物志》、《广人物志》五部，还归在名家类中，在《明史·艺文志》则无名家一类，而是总附于杂家类中了，似乎

名辨思想正渐趋杳然，其实它是向另一种形式转化了。如象数推衍的一套理论，实际上是有意在逻辑上作文章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树立了一个新的体系。邵雍、周敦颐开始了象数推衍之说，张载则把象数推衍引向了科学的认识。二程的“理学”，朱熹给予发挥，集为大成。陈亮、叶适对二程、朱、陆，给予了极其尖锐的批判。他们着力的自然是自己的立身之论，但对逻辑又都不能不涉及。或假古人之辞，或立新论，都使之为建树自己的理论体系去发挥思维的逻辑。而罗钦顺、王廷相、李贽对于正确思维的科学形式则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有了新的见解。对于上述诸家逻辑思想的分析研究，本书所述只是个初步，还应向更深、更广处作进一步探讨。

第三节 唐—明时期汉传因明概观

因明是印度的佛教逻辑，它渊源于婆罗门六论之 的正理论。

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非常活跃，流派纷繁，婆罗门有六大正宗之分，佛教则有大小乘的对立，小乘又分十八部，大乘也有十大论师的不同，此外还有耆那教和顺世论等等，派别间论争极为频繁。为适应论辩的需要，正理论和佛教都很重视辩论术和逻辑的研究。佛教吸收正理论的一些思辩方法，形成了自己的逻辑体系——因明，经过慈氏、无著、世亲的发展，佛教古因明轨式渐备。但古因明“虽纲纪已列，而幽致未分，故使宾主对扬，犹疑立破之则”^①，于是陈那又作进一步的改革，形成了新因明的系统。

一、唐以前传入的古因明

因明是随着佛教的东流而传入我国的。早在公元421年（北凉玄始十年）前后，中印度僧人昙无讖在北凉王沮渠蒙逊支持下，

^①《大疏》卷一。

译出《大般涅槃经》世称《北本涅槃经》。此经第十七卷破十外道，运用了古因明的方法。后来南朝刘宋的慧严、慧观与谢灵运等根据《北本涅槃经》改订，成为《南本涅槃经》。此经的逐译与译文的改订，当为古因明最初传入我国的标志。接着又有三部重要的古因明专著先后在我国北方和南方译出：

第一部是《方便心论》，系三藏吉迦夜与昙曜于公元472年（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译出。此书的著者不详，过去有传为龙树所作的，但近人一般认为当为小乘学者的著述，成书时间约在公元一世纪。小乘学者针对当时胜论等学派论法上的分歧，“为欲利益众生，故造此论”^①。此书分为四品：第一是《明造论品》，列出了八种深妙论法，故此品为全书的重心；第二是《明负处品》，专论堕入负处的种类，但未标明序数，故学者有将负处约为十七种的^②，也有约为九种的^③；第三是《辩证论品》，举例说明判别正邪论说的方法；第四是《相应品》，阐述了二十种问答相应之法。《方便心论》的梵本已佚，汉译本虽诘屈聱牙，但仍为传世的重要译本。

第二部为龙树的《回诤论》，系三藏毗目智仙与瞿昙流支于公元541年（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译出。此书是龙树为批评正理派的量论而作。《回诤论》的梵本已佚，汉译本当为传世最早的本子^④。

第三部是世亲的《如实论》，系三藏法师真谛于公元550年（梁简文帝大宝元年）译出。真谛并写了一部《如实论疏》，惜

①《方便心论·明造论品》。

②如宇井伯寿所说，参见《印度哲学研究》第2卷第547—554页。

③如许地山所说，参见《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燕京学报》第9期）。

④我国另有藏译本传世，题作《压服诤论颂》（Rtsodpa—bz—logpahitshi—
je—hur—byas—pa）。

已失传。现存的《如实论》亦非全帙，只是最后一部分，名《反质难品》。在《反质难品》中，又分三品：第一是《无道理难品》，此品列出许多“无道理”言说的例子，从多方加以辩难；第二是《道理难品》，此品列出三类16种误难和五种正难，当系吸收《正理经》第5卷第1章的内容重行厘定而成，但其形式更为严谨；第三是《堕负处品》，此品列出22种负处，数量与排列次序与《正理经》相同，只是名称与某些解释略异。

上述三部重要的古因明论著译译为汉文，是中国逻辑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当时的思想界不无影响，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论述体例上明显受到古因明的影响。

二、汉传因明的极盛时期

唐代之前传入的因明都属于古因明的系统。陈那的新因明虽在《方便心论》译到我国来的时候已在印度诞生，并很快产生了影响^①，却并未及时介绍到我国来。直至唐代初期，玄奘游印东归，才传输到中土一带。

玄奘是印度“中古逻辑之父”陈那的三传弟子，在因明研究上独步当时。他于公元645年（唐太宗贞观19年）载誉归国，携回大小乘经论等书计520夹、657部^②，其中就包括36部因明论。玄奘先后译了《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等书，并向译寮僧众传授因明，倡导研究的学风。其门下诸大德亦均以能掌握这门时兴的工具知识为荣。由于因明的初倡，且其义趣幽隐，故诸大德备记玄奘口义，结合各自的理解，竞作文疏，竟使因明的研讨蔚为一时之风气。今仅据引录所见，玄奘门人撰写的因

①上述20种因明论疏等，今仅存文轨、神泰、窥基所著的3种。

②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所说的总数；但据同书所列玄奘携回之各种经论数相加，实为658部。

明论疏等约有二十种之多，如弘福寺文备、总持寺玄应、嵩山镇国道场定宾、蒲州栖岩寺神泰、西明寺圆测（新罗国人）等都对《正理门论》作了疏解；又如总持寺靖迈、唐兴寺灵隼、荐福寺胜庄、汴周壁公、庄严寺文轨、慈恩寺窥基、安国寺利涉（西域人）以及神泰、明觉、文备、净眼、玄范、顺憬（新罗国人）都对《入正理论》作过疏解；再如慈恩寺普光撰有《对面三藏记》，黄龙寺元晓（新罗国人）撰有《判比量论》^①等。

由于因明创行，也感染了佛门外的学者，如吕才在幼少之旧栖玄法师的激发下，勉力钻研因明，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3卷，针对神泰、靖迈、明觉三家的义疏的分歧，揭发其矛盾，结果却引发了一场僧俗之间的论战。

在玄奘之后，高僧义净（635—713）由海道赴印游学，历时25年。他于公元695年（武则天证圣元年）携佛典返国，先后主持过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的译场。在义净所译的经典中有两部新因明的代表作，一是陈那的早期著作——《入正理论》，一是陈那的晚期著作——《集量论》。前者除开首处增加了3百余字的一段话以外，其余基本抄录玄奘所译的《因明正理门论》，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正理门论》的释论，只译了个开头，正文则采用玄奘的原译；后者当是《集量论》的最早译本，然已不幸亡佚^②。

唐代的因明论疏除玄奘门下诸大德所撰外，其重要者尚有窥

①《集量论》的梵本已不传。今幸存藏译本，吕激据以译成《集量论释略抄》（《内学》第4辑，1928年）。又，法尊更有全译，《集量论略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如陈那提出“因三相”的理论后，胜论派大师赞足在《赞足疏》中也说“因三相”，赞足的“因三相”说当受到了陈那的影响。又：正理派的重要理论家乌地阿达克拉虽在《正理经释补》一书中竭力批判陈那的“因三相”说，但实质上他也采用了“因三相”的理论。

基门下慧沼（650—714）所撰的《因明义断》2卷，《因明入正理义纂要》3卷，《因明入正理论续疏》2卷，《二量章》1卷和《略纂》3卷；以及慧沼的门人智周（668—723）的《因明论疏前记》和《后记》各3卷，《抄略记》1卷；与智周同门的道邑则撰有《义范》3卷；道曦撰有《义心》1卷；福聚寺僧如理撰有《纂要记》1卷。唐代因明研究的高潮，至慧沼师弟告终。

三、余绪

唐代的因明研究由于玄奘的倡导和慈恩宗诸大德的发扬，经历了最为灿烂的时期，在中国逻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但是自武周已还，由于武则天扶植禅宗和华严宗，加上慈恩宗本身经院哲学的烦琐等等原因，竟趋于式微，其后宗脉细微，传承亦复不明，因明之学原为慈恩一系所创行，随着慈恩宗的衰蹶，因明研究也就逐渐冷落了下来。据凤潭《瑞源记》所录书目，智周以后至唐末，虽历时一个半世纪之久，然所出疏记仅10种左右，且已全部亡佚，其著者和书名为：天台清平的《因明注钞》2卷，北川传量、恒州明量的《因明论疏》，章敬寺择邻的《因明论疏糅钞》3卷，慧首、智颖以及安国寺清素各人均撰有《纂要记》（各1卷），金城俊清的《义断记》，北川茂林、天台崇俊和惟阳法清、总持寺从芳各名人所撰有《因明疏记》，云俨的《因明疏钞》8卷。此后自五代至元末，长达460余年，仅北宋有17种因明疏记见于著录，宋并州崇福寺继伦的《演密钞》7卷，敬田的《义枢钞》12卷和《补阙钞》1卷，澄净的《义雄钞》7卷，慧智的《义曦钞》6卷（另科文1卷），福善的《古今钞补正衡》2卷，怀雅的《集玄手钞》3卷，义深的《演密手记》3卷，惠深的《演密手钞》2卷，达瑜伽的《备阙手镜》3卷，从隐的《略钞》2卷，惠素的《要略记》，本真的《逐难略释》1卷，悟真的

《备阙略钞》2卷，无盛的《洞秘研精钞》2卷，义幽的《精正钞》8卷（男科文2卷），延寿的《宗镜录》（第51卷）。上述17种疏记除《宗镜录》外，其余亦复不传于世。

唐宋的因明论疏记钞本来就流传不广，基本上限于佛门的范围，随着时世的变迁，一些疏记更逐渐散失，大约迄于元代几乎亡佚殆尽。故至明季，虽有明显、智旭、真界和王肯堂等人的探赜索隐，然问世的因明疏记更少，仅六种而已，如明显有《因明入正理论直疏》1卷和《三支比量义钞》1卷，智旭有《因明入正理论直解》1卷和《真唯识量略解》1卷，真界有《因明入正理论解》1卷，王肯堂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1卷等，而且这些著作由于缺乏唐初诸师论疏的参考，故所述难免逞臆，不无摸象之诮。

第四节 藏传因明概观

因明传入西藏的时间比汉地晚，但在翻译陈那、法称等人的著作方面，其数量之多，注释之完备，讲传著述之盛，远远超过汉地。千余年来因明在藏地传译、讲说、著述，乃至在学经时应用因明论式以辨明经义，一直相沿不衰。

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因明的传入约在赤松德赞时期（公元8世纪）。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的首座寂护（Santaraksita）应赤松德赞的邀请，曾两次入藏传法。寂护精通因明，著有《真理要集》等书。之后，寂护的弟子莲花戒（Kamalasila）也到西藏传法。于是印度因明的一些著作开始传译过来。自赤松德赞建桑耶寺（约在779年建成）后约60年期间内，翻译因明论典之论师有吉祥积、智军、空护、法光等4人。先后译出的法称著作有《正理滴论》、《因一滴论》、

《观相属论》及《观相属论法称自注》、《成他相属论》等5部；译出律天著《因滴论疏》、《成他相续疏》、《观所缘论疏》等4部；皆法称偏重因明论式之书及其注释。另有寂护与法光译出陈那《因轮论》1部。此16部著作，现均存“丹珠尔”量论部。当时有无讲授传承著述，因史册未见明文，难以窥见。

约11世纪（西藏佛教后弘期初期），玛·霉必喜饶（曾亲受印僧宝贤和阿底峡的教诲）及其弟子辈琼卜扎塞，除翻译了一些印度因明著作外，还开始自己撰写因明书藉并为徒众讲解传授。

北宋后期，西藏有翻译大师罗丹喜饶（1059—1109）曾赴迦湿弥罗留学17年，留学期间，与他的老师合作译出法称的《量抉择论》及法上等人的因明论书，共有七、八种之多。后任西藏桑朴寺堪布，讲经授徒，听众前后达2300人。桑朴寺遂成西藏地区传授因明的中心，学者辈出。南宋初，罗丹喜饶四传弟子法狮子（1109—1169）任桑朴寺第6任堪布18年，因明的讲解传授，更是盛极一时。法狮子著有《量抉择论释》，并为初学因明者造《量论摄义祛蔽颂》及自释，和另一部《量论摄义》（长行本）。史称法狮子的上首弟子有精进狮子等八大狮子。时西藏各派显教学僧之习因明者，多来桑朴寺学习，此后二、三百年仍持续不衰。

13世纪早期，西藏又出现了传授因明的另一中心，即萨迦寺。萨迦班底达庆喜幢，藏名贡噶坚参（1182—1251，萨迦四祖）简称萨班。他曾从那烂陀寺座主大班底达释迦吉祥贤及其弟子辈学习法称所著《量评释论》等7部因明论及其他佛教经论。后撰《正理藏论》，概括地阐述了陈那和法称的因明学说，并对印度和西藏的各种旧说加以全面的总结。此书颇为时人重视，流传广远。萨班之学，当时由其弟子三人分别在萨迦寺东、西、前三院讲授。